



营造风朗气清的文艺创作氛围

□ 陈 锋



文艺繁荣发展是时代兴盛的一个标志，其中最根本的是涌现一批赢得人民认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文艺评论“亮剑”各种不良文艺作品、创作现象和社会思潮，是文艺创作健康开展的镜鉴、良药和重要保障。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明确了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尺度标准，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方向指针。

“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创新性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夯实了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理论基础，铸就了廓清错误思潮干扰、营造健康创作氛围、推动优秀作品生产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建构起文艺实践最先进的精神指引和批评准则。在初创时期，恩格斯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文艺评论原则。在苏俄革命实践中，列宁论述了文艺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应当坚持党性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时，“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从而确立了党性、人民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标准，指明了苏俄文艺评论和文艺事业的方向依循。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充分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社会功能，毛泽东鲜明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是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倡导“革命文艺”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繁荣发展文化艺术，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二为”方向及时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警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江泽民强调，文艺工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尊重和保证个人的创造性，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对于文艺生产及文艺评论，胡锦涛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

守正创新、继往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的重要论述负载深厚的历史感和理论底蕴，在新时代承继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学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境界，针对文艺界的现实问题和错误思潮，校准文艺评论“定盘星”，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的观点，就是坚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源自生活、高于生活，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创作成就，都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通过艺术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活及其环境条件，亦即艺术地呈现社会生活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现实主

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等各种门派所取法。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性的偶然结果，任意裁剪、歪曲以至于丑化历史，“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高品质的红色革命文艺作品精彩纷呈，重温辉煌岁月，展示光荣传统，历史虚无主义受到有力打击。

人民的观点，就是牢固树立新时代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本质原则。先进文艺植根人民、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以精品力作承担教化社会、凝聚人心、培根铸魂的职责。因此，要坚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耽美主义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脱离大众、脱离现实。近年来在国际上和网络空间比较盛行的民粹主义，则带有非理性和极端化的消极倾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具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都需要审慎分析和积极引领。

艺术的观点，就是充分尊重和遵循艺术规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艺术活动通过对具体形象的认知而直感地把握生活世界的本质，艺术性体现为角色的刻画、情节的发展、矛盾的展开、冲突的处理、细节的描述等技巧和形式，艺术精神则是人们具体而又体现总体、感性而又蕴藏理性、直观而又富有情感、形象而又彰显思想地把握世界的专有方式。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必不可少对艺术性的讲求。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

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故而，对于文艺生产中的说教主义、娱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罔顾艺术性的倾向和思潮，都要予以坚决批判和有力矫正。

美学的观点，就是全面展现和彰显“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特质来进行审美活动，深刻把握真善美的统一。文艺评论作为审美活动，不仅要直接感受作品的艺术性，更要体味领悟其思想性和价值观念。“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审美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和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复古主义思潮逆流而行，在回溯既往传统文明中反思西方现代性，一方面反拨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厚古怀旧的社会心理，萌发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判断。西方后现代主义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在社会上滋生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思想倾向。还有的文艺创作生产服膺消费主义，在追逐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的浮躁和喧嚣中，边缘化了社会效益，淡化了社会责任。诸如此类的不良现象和思潮影响，都需要有高度、有力度的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予以纠治，助力文艺生产坚守社会价值和审美理想。



明代御史张盛美的“四不”准则

□ 徐晓方

明朝末年，政局晦暗，但仍有不少清官坚守本心，忠正直行，不随波逐流，张盛美就是其中的一位。张盛美是山东滕州人，曾先后担任过凤阳府推官、宿州知州（代理）、贵州道监察御史、分守河北道参议等职。他生平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处置过多起重要案件。他在所著《署甬罪言》一书的自序中，提出了为官的“四不”准则，即“不畏强御，不辟诽谤，不谋道旁，不避艰险”，并且自己也始终按照“四不”准则为官行事。

不畏强御。张盛美入仕之后就被授予了凤阳府推官一职，当时正值崇禎继位之初，魏忠贤把持朝政，宦官势力十分强大。凤阳府是明太祖朱元璋老家，为皇家汤沐邑，宦官在此处耀张跋扈，为祸一方。张盛美到任后，毫不畏惧他们的势力，将为首的宦官依法惩办。

不辟诽谤。张盛美担任监察御史三年，先后上书一百余次，经常两三天就要上书一封。他尽忠职守，只要发现问题，立即上书表陈看法，对犯法者绝不姑息纵容。由于忠正耿直、不留情面，张盛美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明里暗里遭受了各种诬陷和攻击，但他始终刚正不屈，依旧直言进谏，于是京城人给他送了一绰号——“张舍命”。

不谋道旁。道旁喻指路边见识短浅之人。张盛美遇事勇于决断，不为

周围的浅见之人所干扰。有一次，宿州的市井无赖和监狱犯人发生动乱，情况十分危急。张盛美临危受命，代理宿州知州一职。当时，张盛美恰巧在桐城、舒城一带出差，考虑到事态严重，迟则生变，于是当机立断，火速赶回宿州。为了节省时间，他日夜兼行奔波了几百里路，终于在事态扩大之前赶到了任所。不出所料，宿州城内人心惶惶，危机四伏。在了解到这次动乱的根源是前任宿州知州昏庸无能、办案粗暴后，张盛美果断采取宽严并济的应对措施，对此次犯错的官员和差役没有急于追究责任，而是勒令改正，并通过禁止争讼、停征赋税、裁汰冗员、清理冤案等一系列措施，将引发动乱的直接诱因全部清除。不仅一举平息了动乱，还使一向盗贼猖獗、诉讼不断的宿州恢复了安定局面。

不避艰险。张盛美得罪了一大批权贵，被以升迁之名，调离京师，出任河南布政司分守河北道参议，驻怀庆府。怀庆府治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是郑藩所在地。郑藩，即郑王藩府。郑王朱载堉昏聩无能，藩府大小事务都由世子朱翊钤把持。朱翊钤生性贪婪狡诈，目无法纪，视人命如草芥，肆意攫取百姓的田产财物，而且只要听说有人对他不满，立即就将那人抓到藩府狱中杀害。朱翊钤还私自设立军队，打造兵器，招募爪牙，意图谋反。朱翊钤手下有十四名

得力干将，人称“四凶十恶”，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当时的怀庆府基本上处于朱翊钤的控制之下，民怨沸腾，动乱一触即发。恰逢朝廷要检阅护城河，朱翊钤又借着凿河的机会，擅自征发六县民夫，开通王府门前的天阿池以方便乘船游乐。当时已是入冬时节，民夫们站在冰冷的河水里干活，却连最基本的口粮都得不到，无不心怀怨恨。张盛美见此，立即发布公告，停止开凿护城河。民夫们一见公告，不约而同地欢呼，随即飞奔回家去了。张盛美通过这件事赢得了民心、稳定了民众，却得罪了朱翊钤，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不久，朝廷颁布新的法令，严禁各藩府强占百姓土地。多年来蒙受委屈的百姓终于有了申诉的机会，成群结队地到府衙投递诉状。短短几天时间，府衙里堆积的诉状就达上千份之多！郑王府逼迫张盛美不准过问百姓诉状以及“四凶”罪行，企图将案件强压下来。但张盛美毫不畏惧，坚持要依法惩办。朱翊钤怕“四凶”泄露郑王府谋反阴谋，当夜就将他们灭口。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官府从郑王府附近的井里、河里捞出了几千页甲片，朱翊钤谋反的证据被公之于众。朱翊钤见事情败露，便主动示好，被张盛美严词拒绝。气急败坏之下，朱翊钤又多方联系京城势力，诬陷诽谤张盛美，企图将他驱逐出怀庆府。不过，在巡按御史的努力下，朱翊钤谋



反的罪行最终坐实，被下狱赐死，强加在张盛美身上的诬陷诽谤也不攻自破。这桩明末的谋反大案最终落下了帷幕。

张盛美在各地任官时秉公办事，解救了很多饱受欺凌的老百姓，深受他们的拥戴。当他离开怀庆府时，当地百姓焚香饯送，数百里不绝。他提出的“四不”准则，体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廉吏的为政修养，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因此，做好群众工作，增强群众工作能力，始终是党的工作的关键，也是每一个干部必须掌握的本领。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就紧密联系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两大任务，从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和革命斗争实际出发，注重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以“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

加强和改进支部工作。1929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决定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以此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使党的组织下沉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引导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1931年5月中央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提出“关于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在各省必须有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在各大产业区域，必须利用种种方法——如打进生产，发展辅助组织等，打进重要的企业中去。支部的建立必须是真正党与群众的连环，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有牢固的基础，支部在工厂中要有紧密的群众组织围绕。坚决地与支部不作群众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支部的建立深入到各个工厂、企业、村组等，就深入到了社会最基层，也就抓住了群众，为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就是因为党的工作始终从解决群众具体生活问题出发、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专题报告时提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当年在苏区，党的领导干部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经常深入乡村作调查研究，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很多家庭的青壮年当了红军以后，家里的地没人种了，他们便代为耕种。在物质匮乏情况下，党和苏维埃政府仍然努力办好一所所乡村小学，让苏区大部分适龄儿童都得到免费上学的机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干部提高了群众工作能力，也使得广大群众认识苏维埃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加强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方法指导。关于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还指出，“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这里，毛泽东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提升干部

如何提高中央苏区时期干部群众工作能力

□ 张友良

群众工作能力的方法，即反对官僚主义、采取实际的具体的方法，抛弃命令主义、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以此提升干部群众工作的能力，完成中心工作。

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劳动是干部的必修课，修出的是干群“鱼水”关系。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校的学员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学员平时甚至课间休息时，都主动下田同当地老表们一道犁地、担粪、插秧，他们同群众一样，卷起袖子，挽起裤腿，打起赤脚，个个都是劳动能手。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周边群众建立起浓厚的感情。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肖锋回忆：“今天来明天去的老表们，和我们非常亲热，一点也不感到生疏。有事就叫我们去干，有东西就拉我们一块吃。我们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干部只有经常和人民一起劳动，才能和人民心连心，才能够增强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注重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以应对战时需要，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效性。在这些有针对性的方针指导下，苏区广大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使苏维埃政府更加廉洁高效，“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团结起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校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心任务和革命斗争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合理设置培训课程，培养锻造出一大批适应当时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工作能力强的党员干部队伍，为取得革命最后胜利提供了人才保障。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实行的丰富多样、务实管用的干部教育方式方法，为新时代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提供了丰富营养和镜鉴。